

贵州威宁县民族杂居区土地改革研究

马玉华

(云南大学 历史系,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既是民族杂居区, 又是历史上受基督教影响较大的地区。1952年5月至10月, 威宁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为使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 威宁县委结合本县实际, 提出了土改运动中特殊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但在实际工作中, 仍然出现了一些违反政府政策的问题, 如“威宁七区事件”即为贵州省土改运动中违反民族政策的典型。

关键词: 民族杂居区; 土地改革; 贵州威宁; 民族政策; 宗教政策

中图分类号: F3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15)05-0093-10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5.05.016

A Research on the Land Reform in the Ethnically Intermingled Area in Weining County of Guizhou Province

MA Yu-hua

(Department of History,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China)

Abstract: Weining in Guizhou province is an ethnically intermingled county of Yi, Hui, and Miao peoples, which was also historically influenced by Christianity greatly. From May to October in 1952, the land reform was implemented here and the local government issued the special ethnic and religious policies to meet the need of the contemporary situation and to push the reform. However, some policy violations were found such as the typical Event in the Seventh Area of Weining.

Key words: ethnically intermingled area; land reform; Weining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 the policy on ethnic; the policy on religion

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威宁县)地处贵州西北部, 面积 6 295 m², 是贵州省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一个县。其东北与贵州的赫章县接壤, 东南与六盘水市毗邻, 南邻云南省的宣威县, 西与云南会泽隔牛栏江相望, 北与云南彝良县相连, 西北紧邻云南的昭通市。

威宁是一个民族杂居区, 这里居住着汉、彝、回、苗、布依、白、水、侗、壮、土家、满、蒙古、仡佬、黎、瑶、藏、朝鲜、畲族等 18 个民族。2008 年, 全县总人口 126 万, 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25.1%, 其中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有彝族 10.88 万人, 回族 9.79 万人, 苗族 6.78 万人。^①1950 年, 威宁建立了

民族民主的联合政府; 1954 年 11 月 11 日, 成立了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1955 年 6 月 21 日, 改为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这是贵州省唯一以彝、回、苗三个民族为主体的自治县。

土地改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内容, 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发动群众、开展革命的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 在新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这对于巩固新政权具有重要的意义。1950 年 6 月,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并公布实

收稿日期: 2015-05-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 世纪贵州威宁石门坎苗族百年社会文化变迁”(09BZS032)。

作者简介: 马玉华(1965—), 云南昭通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西南边疆历史的研究。

①威宁自治县民族宗教局:《威宁自治县民族宗教工作开展情况汇报》, 2008 年 5 月 6 日。

行。1950年冬到1953年春,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采取的是“谨慎稳进”的方针^①,并不打算尽快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改革。1950年,随着西南地区剿匪的顺利进行、中央西南少数民族访问团的到来和汉族地区群众反封建运动的开展,少数民族的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年七八月间,贵州境内的少数民族由于受此影响,产生了要求改革的情绪,尤其是居住在高寒山区的苗族群众非常积极,他们强烈要求进行土改,“而且比汉人还迫切”,“因为贵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们绝大部分种汉人的地,而且是山坡地”。^[1]

威宁的少数民族群众要求土改,这与威宁的自然条件、经济水平、阶级状况和广大群众缺乏土地等因素有关。

威宁地势高寒,海拔在2300~3200 m,有“贵州屋脊”之称。20世纪50年代,全县面积6317 km²,耕地面积1178415亩(78561 hm²),占全县土地面积的6.5%。耕地中计有水田23633亩(1575.5 hm²),水田仅占耕地面积的2%;旱田28689亩(1912.6 hm²),占耕地面积的2.4%;其他土地126093亩(75072.86 hm²),占耕地面积的95.6%。全县农业人口347109人,平均每人耕地面积3.4亩(0.23 hm²)^②。

由于土地贫瘠,气候寒冷,威宁农作物生产受到限制,以种植包谷(玉米)、洋芋(马铃薯)、荞麦为主,这些就是当地群众的主食。威宁农业耕作技术落后,肥料缺乏,一般是广种薄收,普通的为一年一作进行轮栽,较贫瘠之地,多行休耕,三年种两季或者三四年种一季。丰收之年亦不足供给本地口粮,如果遇到灾年,粮食更加缺乏。1951年,威宁评产

的结果为常年农产量87893523斤(43946761.5 kg)(包括所有农业和副业产物,均以稻谷折合),平均每人可得251斤(125.5 kg)。1951年,实际产量是82114901斤(41057450.5 kg),平均每亩产69.6斤(34.8 kg),^③其单位产量非常低。尤其是居住在山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终年劳动却不得一饱,所以他们多随垦随荒,居民四散居住。

新中国成立前,黔西北的彝族、回族、苗族聚居区群众处于农奴制和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双重压迫下,土地基本为土目和新兴地主所霸占,威宁县的土地则基本上是彝族土目所有。土目除了占有大量的土地和生产资料外,还拥有许多丫头、娃子^④等私有财产,而且可随心所欲地将其赠送、陪嫁和买卖。土目家中还有私人武装^{[2]920},他们与地方旧政府一起对各族群众进行统治。因此,威宁少数民族群众称彝族土目为“官家”,是衙门,彝族土目家中有监狱,设有刑具,如彝族土目禄贞祥家的手链脚铐重一百多斤。^⑤

1952年,威宁县的全部人口有35万多人,其中,彝族37897人,占总人口的10.82%;回族23904人,占总人口的6.8%;苗族22761人,占总人口的6.47%。^⑥土改前的调查统计显示,威宁占农村总人口6.16%的土目、地主和富农,占有全县总耕地面积的50.9%,而占农村总人口近94%的各族农民,没有土地或只有少量的土地。^[3]威宁是少数民族杂居区,但全县少数民族的分布不均,有的乡少数民族人口较多,如中水乡60%是回族,五区、六区也有不少村寨是回族聚居。而在少数民族较多的乡,少数民族地主所占比例较大,如八区4个乡的初步统计中234户地主中,汉族地主只有25户;又如,六区2个乡共有地主88户,其中彝族地主47户,回族28户,汉族13户。^⑦

①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局批转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对今后民族工作的意见(草稿)》,1953年4月7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110。

②《威宁轮廓介绍及开发的意见》1953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7-1-85。

③《威宁轮廓介绍及开发的意见》,1953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7-1-85。

④“丫头”和“娃子”,即奴隶,在威宁被称为“私房”。

⑤威宁县委:《关于反映威宁民族情况的调查报告》,1951年6月,贵州省档案馆藏:47-1-34

⑥毕节地委会:《威宁县少数民族工作检查报告》,1952年12月12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7-1-55。

⑦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威宁目前反封建斗争的几个问题复陈健吾同志的信》,1952年7月19日,载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编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1996年,第165页。

当时,全县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26.13%,少数民族的地主和土目共有1024户,占了全县地主土目总数2001户的51.2%。其中,彝族地主、土目868户,总人数4061人;回族地主93户,总人数为569人;布依族和其他的地主51户,有179人。^①威宁的苗族没有地主和富农,中农也只有573户,3180人,其余的苗族3753户,18862人(指农业人口)全部是贫农和雇农^②,可见,苗族是威宁较贫穷的民族,正所谓“老鸦无树桩,苗家无地方”^③。苗族租种彝族或汉族的土地,而且种的大多为山坡地,他们知道党和政府有土改的政策后,要求分配土地是合理的。另外,苗族群众住在高山上,他们还有一种担心,就是害怕土改搞晚了,分配不到好地。

1950年,面对苗、彝民族要求改革的问题,中共中央西南局保持了清醒的态度,认为:“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前的工作仍然是应当集中力量调整民族关系,使他们了解并相信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首先消除历史上对大汉族主义所造成的疑惧与对立,求得团结互助、友爱合作,而不急于进行社会改革发动阶级斗争。”当然,不容忽视少数民族的改革要求,在真正条件成熟的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可以稳步地开始进行社会改革,“但在进行这种改革时,不应把汉人区的一套搬去”,在“一般的边沿区和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必须严格制止这种活动”^④。威宁是贵州的边沿区,自然条件艰苦,因此,威宁的土改运动到1952年才进行。

1952年7月,贵州省委制定了《对目前少数民族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要求少数民族地区认真贯彻中央的民族政策,注意民族特点,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严禁强迫少数民族说汉语;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并由各族干部来领导进行土改。在土改

的方式上,省委提出: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协商和斗争相结合的方式。为了减少土改的阻力,应联合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和宗教界上层人士,并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根据少数民族的情况,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在方针和政策上必须严加控制,打击面要窄,不进行反恶霸的斗争。在阶级划分、没收和分配等方面必须认真由少数民族自觉自愿进行,不得有任何强迫命令。^{[2]920-921}上述政策对于威宁的土改运动起到了指导作用。

二

中共贵州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根据威宁的地理、社会、经济和人文等情况,将威宁县的土改安排在省内的第四期(即最后一批)进行。1952年5至10月,威宁开展了土地改革,全县的土改运动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一)1952年5至6月为土改的准备阶段

此阶段的主要工作是:调集干部,组织领导机关;制定威宁土改的具体政策;宣传土改的有关政策。

1952年5月14日,中共威宁县委发出了《关于土地改革前准备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抓好春耕生产和防灾的基础上,做好土改的准备,如物色和培养农民积极分子^⑤并上报县委,认真学习中央和贵州省委有关土地改革的政策文件等。^⑥5月19日,县委召开了全县少数民族代表会议,通过了在全县进行民主改革的决定。

1952年6月上旬,各区乡将所选农民积极分子的名单上报县里,县委又从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抽

①《威宁县地主情况统计表》,1952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7-1-37。

②威宁县委:《威宁县各民族各阶层情况统计表(土改前)》,1952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7-1-37。

③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对今后民族工作的意见(草案)》,1953年3月,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110。

④《西南局对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改革的指示》,1950年10月10日,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编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1996年,第156-158页。

⑤要求每乡找五六个出身好、个人历史清白、年龄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反封建斗争的积极分子参加土改工作。见《中共威宁县委关于土地改革前准备工作的指示》,1952年5月14日。

⑥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编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1996年,第78页。

出大批人员组成400多人的土改工作队。毕节地委将原在水城、纳雍、赫章三县从事第三期土改的上千名工作队员,选留600名前往威宁帮助开展工作。毕节地委还派出中共毕节地委委员、宣传部长陈健吾^①、蒋海燕^②等人到威宁领导土改。6月,威宁组成了1250人的土改工作队。为了加强对土改运动的领导,各区委的委员会改称为“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工委书记由毕节地委赴威宁的土改干部和县、区部分人员担任。工委下辖土改工作大组,基本以原建制的乡为单位。大组下分小组,小组以村为单位。另外,工作队还制定了相应的工作制度和组织纪律。

1952年6月10日至16日,威宁县委召开了土改工作的专门会议。会上,陈健吾根据老区和新区的土改经验,结合威宁的实际,做了《关于威宁县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威宁土改运动中的特殊民族政策:

1. 土改中一方面“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历史传统”,尤其是尊重少数民族的祠堂、名山、教堂、清真寺等;另一方面要尊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如苗族群众在开会前用苗语谈话,在斗争地主诉苦时用苗话,土改工作队员对此不能讨厌和怀疑;苗族对斗争的果实用苗文记账也要尊重。

2. “对少数民族地主的斗争,决定于其本民族群众的自愿”。如果本民族群众不同意,可以不斗争。在斗争其他民族(原资料为“非其本民族”)的地主时,他们可以参加,并应该分给他们应得的果实。在斗争本民族地主时,应以其本民族群众为主,其他民族的群众也可以参加,如果由本民族的干部来掌握更好。对少数民族的地主、富农,主要是减租退押,反匪首,退匪赃。帮工帮粮是否退回,则由本民族群众自愿决定,其他细账就不算了。“对少数民族的地主不反霸,不反违法”,但犯了法,仍应按照法律办理。

3. “少数民族是否可以下山分田,这决定于他

本人的自愿”,愿意下山也可以,“但不采取动员或强迫命令的方式”。

4. 少数民族中凡过去与政府有过联系的上层人物,基本上采取保护政策,“保护他们过土改关”,但罪恶特别大的则例外。

5. 充分发动少数民族群众,才能把少数民族的工作做好。在各种组织和会议里,“都要以民族人口比例吸收少数民族的代表参加”,如果人口少比例达不到,也要有一个人参加。

宗教政策方面,陈健吾指出:宗教是个人信仰问题,在《共同纲领》上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信教是可以的,是合法的。“在土改中,我们基本上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反之,宗教也不能干涉我们的土地改革,它对政府、对农协都不能干涉。”^③信教的农民可以参加农民协会,如果分地主果实时,他们说是上帝给的,工作队员不能讽刺。如果信教的个别人违反了法律,破坏土改,从事反革命活动,则要依法办理。上述报告是在总结贵州前三期土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威宁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而制定的土改具体政策。

为了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工作,需要大力宣传土改政策。1952年7月18日,威宁召开第五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彝、回、苗、布依等族代表有67人,少数民族代表占了代表总数的29%。接着又召开了第二届少数民族代表会议。两次会议的主题都是研究讨论少数民族地区的土改问题,以及如何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特别是第二届少数民族代表会议上,陈健吾又做了《关于威宁县土地改革中少数民族方面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就土改中少数民族的特殊问题做了具体规定:

1. “对少数民族的历史文物,及带民族性质的公共财产,都要保留,不能征收和分配”。例如,少数民族的“仙山”、“神林”、坟场、坟地、祭祀用地等,以及苗族的跳花场,回族的清真寺及附带的财产,可

①陈健吾,毕节地委委员,宣传部长,地委土改工作队驻威宁县队长。

②蒋海燕,毕节地委派到威宁参加土改运动的人员,1952年10月至1954年12月,其担任中共威宁县委书记,1952年7月至1954年11月兼任威宁县长。

③陈健吾:《关于威宁县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52年6月,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编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1996年,第220-222页。

以保留。

2. 废除彝族的“私房”制度,今后不允许这个制度存在。“私房”以雇工对待,以后不要再用“丫头”“娃子”等称呼;“今后在农村里各种会议及组织中,要尽量吸收当地当过私房的人参加”。在反封建的土改中,“要对当过私房的人很好的照顾,给他们妥当的安家”。有些“私房”的子女被地主卖掉的,可以无条件地领回家。

3. 土改中,不清算少数民族地主的霸占行为。新中国成立前违反法令的,不加处罚。但少数民族地主当土匪抢的东西,要追赔,要依法令他们减租退押和退帮工、帮粮。“如果新中国成立后或目前,有违法破坏等行为,仍要依法办罪。”

4. 在民族杂居村,“农会和村政府的干部,应由各族的干部联合组成”。主要的村干部,如村长和农会主席,应该由各民族中觉悟高、办事公道、能力强、立场坚定的人来担任。要求村里各民族干部要团结一致,“分果实不能分民族,应该依各账各清和生活情况来分配”。^①

这些政策在各族各界代表和少数民族代表中的宣传,为土改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二)1952年6至8月是土改的实施阶段

在此阶段中,威宁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开展广泛的政策宣传,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以及减租退押和清退帮工帮粮的活动。

1952年6月18日,县土改工作队前往各区(乡)开展土改工作。工作队下乡后通过多种方式,如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或农民大会、走村串寨和访贫问苦等,向各民族各界群众宣传党的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威宁有关土改的具体政策。还有针对性地对各民族上层人物和各界知名人士开展思想工作,动员他们与党和人民密切合作,以实际行动支持土改工作。当时,各区列表上报的民族上层人物和知名人士有数十名,其中以石门中学校长朱焕章(苗族)、勺乐多小学名誉校长陆永昌(彝族,革命烈士陆宗棠之父)等

为代表,这些人不仅在本民族中有较高的威望,而且在社会上的影响也较大。经过工作队的教育和争取,一些民族上层人物和各界知名人士积极地支持土改工作。

在宣传政策的同时,开展了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清退帮工、帮粮的活动,为划分阶级和分配土地扫清了障碍。1952年10月,全县依法逮捕匪首276名,惯匪135人,枪毙罪大恶极的匪霸165人,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3577名(其中地主271人),交群众管制232人,释放66人;缴获步枪和手枪180支,各种子弹24269发,手榴弹264枚,以及各种炮弹116个,火枪1092支,其他刀标750把;摧毁反动会道门组织151个(成员2652人),反动党团组织77个(成员339人)。通过斗争和清算,经济上取得了很大的收获,地主交出来分给农民的胜利果实,折合28.62亿元(2862904600元旧币,下同),其中黄金55591两,白银539466两,大洋4914元,小洋101466元,人民币(现款)643377800元,其他的衣物折合人民币1845136000元,另有烟土8452两。^②

另外,对农村基层组织进行了整顿,发展了农民协会。到1952年9月,全县农协会员173095人,民兵自卫队员有20751人,在农村建立了青年团组织,发展团员1592人。^③这样,就壮大了队伍,为土改的顺利完成奠定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三)1952年9至10月为土改的高潮阶段

此阶段主要是划分阶级,查田评产,分配土地。

1952年9月开始,进行了阶级的划分。按照政务院1950年8月4日第四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威宁制定了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和界限,即地主、小土地出租、破产地主、二地主、地主兼工商业、工商业兼地主、半地主式富农、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雇农、贫民、游民、宗教职业者、小手工业者、小商和小贩、开明士绅、恶霸等19类。划阶级成分时,先由户主本人自报,群众评议,再由农民协会审定上报,经区乡农民协会批准

①陈健吾:《关于威宁县土地改革中少数民族方面的几个问题》,1952年7月23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7-1-37。

②威宁县委:《威宁县土改总结》,1952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2-32。

③威宁县委:《威宁县土改总结》,1952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2-32。

后定成分。至9月下旬,经过“三上三下”,“三榜定案”和政府批准,威宁划定了阶级成分。^①全县当时计有74732户,350164人,少数民族有19676户,91612人,被划为地主的有2277户,11385人,其中少数民族地主1024户,5120人,地主主要是在彝族、回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中,苗族没有地主、富农和小土地出租者。^②

在没收、征收和合理分配以前,须全面掌握各户的土地面积和常年产量,因此土改工作队和农民协会以村为单位进行查田评产。各村由农民群众民主选举组成村级查田评产委员会,并由其具体负责评产、查田和登记工作。查田评产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办法,遇到特殊情况则进行实地察看后评议。查田评产时由农民自报自有的土地面积、坐落地点、常年产量;出租土地由土地主人和佃户共报,当场评议和另组织人评议,发现有瞒报产量的,动员补报,否则由评委会组织现场勘察。威宁位于云南、贵州的交界处,许多地主的土地不仅分布在威宁县境内,而且还有不少是跨省的交叉田地。对于交叉性的田地,一般由原耕即佃户村没收或者征收分配;对于出租的土地,由其主人和佃户共同报出;对于瞒报的地块和少报的面积,经过动员或斗争促使其报实,若不补上,即由查田评产委员会亲临实地查看后纠正偏差。

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是土改的重要环节。土改中对地主的土地、农具、耕畜,以及多余的房屋、粮食进行没收。对于富农出租的部分土地,小土地出租者超过当地中农平均拥有数两倍以上土地,工商业者经营的工商业收入足以维持生活后尚余的田地,带有封建性的学田、公地、庙产等,均属于征收分配范围。分配土地的对象,主要是贫农和雇农。此外,土地不够维持生活的中农、生活困难的小商贩和小手工业者,也可以分得适当的土地和财产。

全县共没收地主的土地53181483斤(26590741.5kg)(当时是以常年产量计算),牛

4108头,马骡1639匹,多余瓦房5012间,草房2748间,碉堡637座,农具4499件,多余粮食876483斤(438241.5kg)^③。没收的土地、房屋和财产全部分给了农民。土改中还解放了718户,3600多名土目原有的“丫头”“娃子”。

土改运动进一步扩大了农村的农会组织,发展了人民武装力量,建立了村一级的人民民主政权。威宁土改的完成,打破了原教会组织和保甲制度相结合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建立了村级的基层人民政权,这对巩固新政权、凝聚人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土改,威宁县近94%的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及大批的生产生活资料,贫雇农的土地占有量大幅度提高。以第八区为例,各阶级、阶层土改前后的土地占有情况如下:

地主:土改前2820斤(1410kg),土改后265斤(132.5kg);半地主式富农:土改前1150斤(575kg),土改后401斤(200.5kg);富农:土改前872斤(436kg),土改后432斤(216kg);佃富农:土改前147斤(73.5kg),土改后308斤(154kg);小土地出租:土改前1483斤(741.5kg),土改后652斤(326kg);富裕中农:土改前521斤(260.5kg),土改后516斤(258kg);中农:土改前62斤(31kg),土改后256斤(128kg);贫农:土改前13斤(6.5kg),土改后254斤(127kg);雇农:土改前1斤(0.5kg),土改后302斤(151kg)。^④土改运动解放了生产力,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各族农民的生活。

土改运动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提高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使威宁的民族关系得到了一定改善,如威宁二区元龙村(汉族村子)把斗争的果实——粮食10石,人民币200万元,以及其他的物资送给七区中水乡七村的回族群众;分配土地时,外村农民搬到中水乡七村来,七村的回族群众表示欢迎,还将上等的好地分给外来的汉族和布依

①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1996年,第90-93页。

②威宁县委:《威宁县土改工作总结》,1952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2-32。

③威宁县委:《威宁县土改工作总结》,1952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2-32。

④参见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1996年,第97页。

族群众。又如,一区郑家村帮助彝族的“私房”安家,并举行安家仪式,本村其他民族的群众也前往祝贺。^①

土改运动对威宁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威宁各民族中,彝族人口最多,地主和富农绝大多数是彝族,尤其是黑彝较多。彝族中的土目、地主、富农约占全县彝族人口的30%,并且都是黑彝,白彝和红彝则多是农民和农奴。土改运动使多数彝族农民和农奴获得了解放,分得了土地。威宁县回族人口居第二位,回族中只有很少的小地主,^②土地改革使广大的回族群众获得了土地和生产资料,他们受益较多,对此哈喇乡的回族群众说:“可见青天了。”^③威宁苗族没有地主和富农,历史上其受压迫、剥削最深。土改中,苗族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苗族群众祖祖辈辈的梦想,他们的高兴之情难以言表,他们对于党和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土改后苗族同胞说:“过去老鸦无树桩,苗子无地方;现在人民政府是干人(笔者注:穷人)的爹娘。”^④石门坎附近的苗族群众说:“毛主席好,领导我们分了土地。”^⑤土改运动使苗族由半农耕半狩猎的生活方式逐渐转向农耕和定居,逐渐改变了他们原来的山地游耕文化,使苗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威宁苗族群众大部分信仰基督教,他们对于土地改革,一方面是欢欣鼓舞;但另一方面,苗族教徒又认为:“不分地主和农民,教徒都是一家人”^⑥,这些人觉得都是信教的(彝族也有信仰基督教的),他们不愿意斗争彝族地主土目,因此对土改运动表现不积极。

三

威宁在土改前虽然已制定了有关的民族政策和

宗教政策,但由于地方基层干部对国家的民族政策学习研究不够,干部中存在着“民族问题即是阶级问题”的思想,忽视了各民族的特点和威宁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历史上“大汉族主义”统治的影响存在于各民族人民内心的隔阂,过高地估计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觉悟,没有认真贯彻和执行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存在一些违反政策的问题。

土地关系方面,有的村把不应征收的土地征收了,典当关系的处理还有不妥当之处。例如,把中农划为富农,征收了中农的土地。威宁的土改政策明确规定:少数民族的“仙山”、“神林”、坟地、祭祀用地,以及苗族的跳花场,回族的清真寺及附带的财产等,不征收和不分配,但在运动中错误地征收了少数民族的“祭祀田”“神山”“姑娘田”“打牛场”“马郎坡”以及清真寺的土地等。^⑦

存在错划阶级成分的问题。即把中农划为地主和富农,没收了中农的财产,尤其是对彝族的斗争比较严重。如威宁九区大观二村有46户彝族中农,被错划成地主的有2户、富农有19户,他们中少数被斗争,全部被清算。这21户被错划为地主、富农的中农,被迫交出价值人民币142.4万元的东西和1424元的小洋。另外,村中其他的汉族和苗族中农,没有1户被清算和斗争的。^⑧

出现违反民族政策的问题。首先,对不同的民族进行清算斗争和分配果实时出现不公,威宁则表现在政策向汉族和苗族的倾斜,对彝族比较苛刻,彝族地主少数被斗争,全部被清算,这就使民族关系划上新的裂痕,引起彝族群众的不满。^⑨关于胜利果实的分配问题,在民族杂居的村寨,往往是哪一个民族的干部占多数,哪一个民族的群众即分得多;反

①威宁县委:《威宁县土改工作总结》,1952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2-32。

②威宁县委:《关于反映威宁民族情况的调查报告》,1951年6月,贵州省档案馆藏:47-1-34。

③中共毕节地委:《威宁县少数民族工作检查报告》,1952年12月12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7-1-55。

④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编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1996年,第43页。

⑤威宁县委:《威宁县少数民族工作检查报告》,1952年12月,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80。

⑥威宁县委:《中共威宁县委关于改造落后乡的初步计划》,1955年6月30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146。

⑦贵州省委:《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1953年2月,贵州省档案馆藏:4-1-110。

⑧威宁县委:《威宁县少数民族工作报告》,1953年2月24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2-32。

⑨中共威宁县委:《中共威宁县委关于改造落后乡的初步计划》,1955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146。

之,少数民族干部少的即分得少。^①有的干部还利用不同民族互相斗争、互相评产量,如甲族斗争乙族,乙族斗争甲族。更严重的是,不分土地给少数民族,或把坏田地分给少数民族。^②

其次,土改中部分地方没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例如,威宁七区的汉族干部不尊重回族的生活习惯,强迫回族养猪^③,叫回族村干部给他猪油煎粑粑吃;有的工作队员不喜欢苗族说苗话,怀疑苗族群众在捣鬼,说苗族妇女穿裙子是浪费,甚至要石门坎苗族妇女剪头发,说“不剪头发不准赶场,不准开会”;还有烧毁少数民族的神牌、祠堂等行为。这样,容易形成新的矛盾和隔阂,既不利于民族关系的改善和民族团结的实现,而且使少数民族对党和政府的政策产生怀疑和恐惧。

再次,汉族干部看不起少数民族干部,认为少数民族干部提拔快、不称职,甚至说苗族干部“苗气不通”“脑筋不转”等^④,影响了干部内部的团结。

存在违反宗教政策的问题。例如,威宁土改中没有很好的执行国家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个别干部在石门坎限制教徒做礼拜^⑤,第二、三、八、十三区都焚烧和撕毁过《圣经》和“赞美诗”,引起教徒不满。把不该退押的土地退押,如威宁八区土改工作队,组织群众向教会退押,分配了教会的土地山林,占用教会房屋。^⑥土改干部对石门坎基督教会不尊重,把循道公会办的孤儿院解散了^⑦,八区分委组织干事陈国友,把石门坎基督教会的苹果树用字条封起来,不准教会动,还写上“谁摘苹果,以土匪论处”^⑧,但他自己却随便摘着吃。

对地主的斗争普遍存在肉刑或变相肉刑,甚至

有的干部亲自出马打人。威宁全县13个区,有10个区被斗争致死的地主175名,其中少数民族地主有76名^⑨,占了被打死地主的43.4%。更痛心的是,吊打不仅针对地主,还有贫农被吊打,以致逼死人命,如一区阳关村逼死一个贫农副村长。^⑩威宁七区因为打死太多人,而成为贵州省土改运动中违反民族政策的典型。^{[2]933}

“威宁七区事件”发生在黑姑乡七村,在土改工作队员杨光全(有的资料写成杨刚全)的强迫和指使下,土改中对地主施用肉刑20余种,其手段之恶劣,令人发指,如日夜捆绑、吊打、“鸭子浮水”、“坐飞机”、“骑洋马”、“十指点火”、“打木马”、用火烧妇女阴毛、猪鬃刷子刺妇女乳头、脚踏妇女肚子(致两位彝族孕妇腹中胎儿丧命)、烧红铁钳烫背、辣椒水灌鼻子和灌妇女子宫等。期间,斗死该村地主20人,其中彝族18人,汉族2人,并吊打了8位农民^⑪。同区的迤沟乡十一村被打死、饿死的地主男女老少共有9人。仅七区黑古乡七村和迤沟乡十一村,一共打死和饿死男女老幼29名,其中大人17名,五岁以下小孩12名^⑫。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彝族群众,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在汉族地区土改中都不允许发生的吊打人等残暴行为,却在威宁七区的少数民族村寨中出现,这既违犯了国家的民族政策,也是违反人道主义的行为。尽管相关的人员后来都受到了判刑、撤职、处分等处理,但是留给人们的伤痛却难以弥补,这为后来威宁少数民族的暴动埋下祸根。

威宁土改中违反政策的问题,尤其是“威宁七区

①贵州省委:《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1953年2月,贵州省档案馆藏:4-1-110。

②毕节地委会:《毕节区民族工作检查报告》,1953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110。

③贵州省委:《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1953年2月,贵州省档案馆藏:4-1-110。

④威宁县委:《威宁县土改总结》,1952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2-32。

⑤威宁县委:《威宁县少数民族工作报告》,1953年2月24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2-32。

⑥威宁县委:《关于宗教问题向地委、省委的报告(草稿)》,1956年6月,贵州省档案馆藏:48-2-77。

⑦贵州省委:《关于毕节地委执行少数民族政策情况的通报》,1952年9月,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80。

⑧贵州省委:《关于毕节地委执行少数民族政策情况的通报》,1952年9月,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80。

⑨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局关于贵州监委曾宪辉检查威宁县违犯少数民族政策纪律情况的通报》,1953年2月,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110。

⑩威宁县委:《威宁县土改总结》,1952年,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2-32。

⑪贵州省委:《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1953年2月,贵州省档案馆藏:4-1-110。

⑫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局关于贵州监委曾宪辉检查威宁县违犯少数民族政策纪律情况的通报》,1953年2月,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110。

事件”,极大地破坏了中共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形象,损害了各民族群众的利益。特别是土改中违反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做法,引起少数民族群众、教徒的不满和反弹,他们不断地向县、专区,甚至向贵州省委和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反映情况,引起了贵州省委和中共西南局的重视。同时,全国各少数民族地区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少数民族工作中存在的偏差,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于是中共中央和西南局决定对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进行检查,这即是1952年开始的第一次民族政策执行情况大检查。

1952年10月,中共贵州省委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开始研究和部署全省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工作,各级政府组织力量开始进行检查,威宁县是其中重点检查的对象之一。

贵州省委要求毕节地委调查处理威宁土改中发生的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1952年11月,毕节地委派专人去威宁调查,写出专题报告,^①并提出了处理意见。县委也写了《威宁县少数民族工作检查报告》《威宁少数民族工作报告》《威宁县土改工作总结》等,但这些检查报告“多是现象罗列,缺乏分析”^②。

同时,贵州省委派省监委主任曾宪辉到威宁调查“威宁七区事件”。曾宪辉给贵州省委及西南局的报告中,包括打死地主的情况、施用的刑法、违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及善后处理的问题等内容。并且,曾宪辉提出了善后处理的方案,准备采取一些措施来进行补救,如对扫地出门的守法地主,“立即分给房子,补给粮食、用器、田地,安置未死的小孩”;对于错划了阶级成分,被当成地主、富农错误斗争的中农和贫农采取补救办法,“中贫农的财产斟酌偿

还”,“对其安慰”;教育中共干部,并让他们向群众解释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要跟少数民族解释清楚“此次乱打乱斗是违犯政府政策纪律的行为”;对事件的相关人员“分别责任,给予处分”^③;要求立即停止违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已经有违犯的地方,“对少数民族进行解释宣传我们政策,使少数民族对我们政府政策没有怀疑和恐惧”^④。

中共中央西南局强调:“威宁县违犯少数民族政策的现象是严重的”,要求毕节地委和威宁县委必须妥善处理,“不仅要如数退还被没收之中农财产,而且应首先改订错划的成分,恢复中农成分;对于违犯民族政策的干部应受到处分,品质恶劣者从严,以教育干部,平息群众的不满情绪”^⑤,并“责成该区县领导上进行检讨,总结经验,认真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接受此次经验教训,并发动有关干部结合此次事件的教训,学习一次少数民族政策,以提高干部的政策水平和纪律教育”^⑥。

1953年1月,在贵州省委召开的全省民族工作会议上,毕节地委的马有庆汇报了毕节地委对威宁的调查情况及地委的处理意见。但贵州省委认为:毕节地委对威宁违反政策的处理意见不严格、不具体,如威宁“县委检讨不深刻,对区委没有适当处分,对下面违法乱纪的干部没有严肃处理”^⑦。在会上,省委要求马有庆转告毕节地委,必须对违反政策的问题重新处理。会议还就少数民族地区土改遗留的问题,提出了具体政策,如“错征收的祭祖山、马郎坡等有关少数民族风俗的土地应一律原地退还”,对被抽回土地的农民,应从机动田中予以补酬;“错划成分者应坚决予以订正”;“田地分配不公

①中共毕节地委会:《威宁县少数民族工作检查报告》,1952年12月12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7-1-55。

②贵州省委:《关于各地、县委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中几个问题向中央、西南局的综合报告》,1953年7月10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110。

③土改干部杨光全被关押判刑;在该区掌握工作的威宁县委副书记李某某经毕节地委建议撤销职务;其他相关人员受到了处分。

④曾宪辉:《检查威宁县违犯少数民族政策情况摘要》,1953年1月,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110。

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局关于贵州监委曾宪辉检查威宁县违犯少数民族政策纪律情况的通报》,1953年1月22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110。

⑥中共中央西南监委党组乔钟灵:《给西南局的信》,1953年1月16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110。

⑦贵州省委:《贵州省委给毕节地委并各地委:兹将曾宪辉同志关于威宁在土地改革中违反政策向西南监委的报告及西南局的批示转发你们》,1953年2月7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110。

者”,应召开民族代表会议,“采取协商方法予以调整”^①;尚有些山林、斗争果实未分配者,应通过各民族协商,予以分配,并对过去分得少、分得坏的农民予以照顾。

1953年2月,威宁县委制订了土改复查计划,并组成448人的复查队伍,将全县270个村分为三类,进行了土改的复查。根据贵州省委指示,本着“加强民族团结,检查贯彻民族政策,解决土改遗留问题,胜利结束土改,转向生产”的方针,针对三类村子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即民族聚居村以“检查贯彻民族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大力转向生产”为主要内容;民族杂居村以“加强民族团结,检查总结土改,转向生产”为主要内容;汉族村子则以“充分发动群众,团结内部,斗倒地主阶级,安定人心,转入生产”为主要内容。^②通过复查,解决了土改遗留的一些问题,至此威宁土改运动全部结束。

威宁是少数民族杂居区,民族关系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历史上由于受到“大汉族主义”的欺压与歧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对汉人的疑惧和顾虑并未消除;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并不完全像汉族中的阶级对立那样厉害;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隔阂与成见,如威宁的“苗族对彝族有意见,因彝族有官家剥削压迫他们;

对汉族也有意见,因汉族统治压迫他们”^③。其中,威宁回族与彝族的矛盾较大,两个民族长期存在争斗,时有械斗和武装冲突发生;同一个少数民族内部还有村落之间或姓氏之间的派别斗争等^④。因此,民族杂居区的土改运动和其他工作,不仅要关注阶级关系,还应该考虑各民族所处的历史地位、民族特点和民族心理,而那种认为“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土地改革完成了就没有民族问题”^⑤,甚至以为“只要阶级关系解决了,各民族不团结闹隔阂也基本上得到解决”^⑥的想法,都是完全错误的,企图用阶级关系来替代民族关系更是行不通。少数民族杂居区的土改运动,如果不加以区别,原封不动地搬用汉族地区的做法,势必会造成违反少数民族政策的恶果。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历史教训。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M]//邓小平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9.
- [2]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贵州省志·民族志:下册[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
- [3]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概况编写组.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概况[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105.



①贵州省委:《贵州省委给毕节地委并各地委:兹将曾宪辉同志关于威宁在土地改革中违犯政策向西南监委的报告及西南局的批示转发你们》,1953年2月7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110。

②威宁县委:《威宁县土改复查计划》,1953年2月16日,毕节地区档案馆藏:7-1-22。

③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编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1996年,第87页。

④《关于贵州少数民族社会改革问题的初步意见》,1950年11月,毕节地区档案馆藏:4-1-34。

⑤贵州省委:《关于检查民族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1953年2月,贵州省档案馆藏:4-1-110。

⑥中共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党史研究室编著:《草海晨曦——威宁解放初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威宁县党史资料丛书之五),四川省叙永县地方国营印刷厂,1996年,第87页。